

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及特点^{*}

郑继永

内容提要 宗教对韩国政治有着重要作用。解放之后,新教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在政治和组织化方面相对完备,美国及韩国的反共主义与对宗教的刻意扶植模糊了宗教与政治的分野。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一定的疏远,宗教内部也出现了对立与竞争,宗教界的政治参与在各种宗教内部保守与进步势力的相互牵制下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民主化时代,韩国宗教界政治参与的最大特征表现为保守阵营的大反攻,宗教界出现大范围的保守化。这种保守化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政治势力化,各派之间组成相应的政治组织或政党,以更大限度地集中政治力量。

关键词 韩国 基督教 新教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郑继永,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博士、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自光复以来,韩国虽然宣称政教分离,也在宪法中确认了这一原则,但从政治现实来看,宗教因素已经渗透到韩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韩国仍然是一个宗教意识非常强烈的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在 2007 年的总统选举中,三个主要候选人中一人是新教徒,其他两人是天主教徒。而在历任总统中,金泳三与李明博本人就是新教的长老,皈依宗教者更是占据大多数,^①国会议员中有宗教信仰的更占据了 2/3,他们是本土宗教、儒教、佛教等众多宗教的代言人。

韩国的政治与宗教如此密切,在现实政治中自然会受到宗教因素的诸多影响,因此,对宗教与韩国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成为重要的方面。本文拟通过对韩国新教参与政治的历史、形式与特点进行考察,以此来探讨韩国政治中宗教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

1945~1960 年间,朝鲜半岛经历了光复与分裂、建国、意识形态斗争、战争与重建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革,朝鲜半岛的政治出现大幅震荡,先有清算亲日派的斗争,又有“左”“右”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加之美苏两国对半岛南北方的刻意扶植,朝鲜半岛政治生态出现严重分化与激烈转型,政治过程表现为美国主导下的军政府时代与李承晚时代

^{*} 本课题为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AKS-2009-R-58)、复旦大学 2009 年“金苗”、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10 年资助项目。

^① [韩]姜敦球:《现代韩国的宗教、政治与国家》,《宗教研究》2008 年第 51 辑,第 1 页。

两个阶段，这是韩国政治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宗教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朝鲜半岛的政治动荡之中，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美国及新成立的李承晚政府对于南半部反共主义与亲基督教势力的刻意扶植使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分野逐渐模糊起来。

自光复之后，新教就积极参与到建国的过程之中，是宗教中较早也是最为政治化的一个。光复之后，新教明确表示对临时政府的支持，积极参与政治势力化进程。曾经共同属于新教的金九、金圭植、李承晚等政治领袖也出现相互联合的倾向。得到美国扶持的李承晚一直敦促基督教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李承晚称，“儒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如此活跃，基督教态度如此消极令人无法理解，希望基督教表现得比‘三·一’运动时还要活跃”。^①在李承晚的推动与支持下，新教在南半部召开了“朝鲜基督教南部大会”，发起成立了旨在推动朝鲜独立和建国的“独立促成基督教中央协议会”。同时，该协会还通过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与天主教、佛教、儒教、天道教、大侬教等宗教团体共同召开了“朝鲜独立促成宗教团体联合大会”。在“朝鲜基督教南部大会”主持召开的会议中，各政治领袖纷纷表达了对宗教推动建国的期待，金九称建国要建立在“圣书之上”，金奎植则要求以“基督为基础”，李承晚则要求国家建立“在基督之上”，^②金圭植更强烈要求新教迅速实现政治化，“耶稣教应实现政治化以在政治上领导三千万民众”。^③南部大会后，新教的政治势力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组成了一个超越各教派、以社会民主党原成员为中心的“基督新民会”，不再坚持教会第一主义，打出了“政治根本运动”和“提高民族生活”的建国旗帜，最终成为金九及韩独党基督教派的支持基础，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时期，新教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政治选举。李承晚自执政之后就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在1952年的第2任总统大选时达到了顶峰。^④韩国基督教联合会组织了

“基督教选举对策委员会”，并由各教派代表担任委员，号召将票投给李承晚这位“基督教人的总统”，^⑤并呼吁全国3500余个教会组织教会委员会，支援选举运动。^⑥之所以支持李承晚，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对“基督政治化”贡献极大，未来也能够成为“韩国基督化”和“民族基督教化”的领军人物。从教会领袖的角度来看，李承晚政府对基督教的支持远胜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宗教的镇压与干涉。因此，教会领袖要求信徒支持李承晚，不仅仅因为他的“护教政策”，也是出于基督教试图得到国家层面帮助的目的。

借新教大力支持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的李承晚在就任仪式中也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感激，并指名国会议员的裴恩熙牧师“在历史性的典礼中，为了国家民族的将来，应首先向上帝祈祷”。^⑦如果说朝鲜战争期间教会反对停战会谈的态度成为李承晚与教会合作的纽带，那么1952年正副总统选举时韩国教会的选举造势运动成为李承晚政权与教会在现实政治中纠葛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1956年的总统选举中，即使候选人是基督教徒，教会也不会明确公开表示支持，教会的报纸也强调教会不能偏向或利用某个政党。^⑧在一份名为《正副总统选举推进基督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新教虽然支持李

① 1945年11月20日《自由新闻》。

② [韩]金兴洙：《基督教人政治家李承晚》，载柳永益编《李承晚总统再评价》，首尔：延世大学出版社，2006，第408~409页。

③ [韩]张始华编《建国训话》，首尔：敬天爱人社，1945，第32~35页。

④ [韩]崔宗高：《第一共和国与韩国新教教会》，《东方杂志》第46、47、48辑，1985。

⑤ [韩]崔宗高：《基督教各派浑然一体！拥戴李承晚博士出任总统之决议》，1952年8月4日[韩]《基督公报》。

⑥ [韩]崔宗高：《基督教人的政治生活》，1952年8月4日[韩]《基督公报》。

⑦ 1952年8月25日[韩]《基督公报》。

⑧ 1956年4月9日[韩]《基督公报》。

承晚和李起鹏为正副总统，但却声称各自所属的委员会并非是由教会团体代表组成的，而是由个人名义组织起来的团体。^①但到1960年的第4任总统选举时，李承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又得到了恢复，自由党正副总统选举中央对策委员会号召教众为李承晚和李起鹏投票，“把票投给能够在政治中反映基督精神的人物”，而李起鹏更发表“致全国教会150万教众”的讲话，号召基督教众为自由党投票。^②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教延续了其参与政治的一贯特征，积极支持并援助了大量物资。在战争期间，韩国教会在向韩美军队表达精神支持的同时，甚至直接组织了敢死队参加战争，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要求美国总统向韩国提供援助以帮助韩国战胜朝鲜。为表达对韩国军队的支持，韩国教会组成“大韩基督教救国会”，并随着韩军的撤退一直提供相应的援助。^③“基督教联合战时非常对策委员会”也纷纷向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麦克阿瑟等人致信，^④并通过决议要求韩国教会合力救助战争中的民众。^⑤在停战之前，新教更是集结了7000余名基督教众在首尔塔谷召开“北进统一祈愿大会”，并在釜山等城市召开“全国基督教信徒救国大会”，宣传教会反对停战的政治立场。救国大会还批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待停战的积极态度令人“深感失望”，称共产主义并非艾森豪威尔所认为的“并非不可饶恕的魔鬼，而是知道悔改的善意罪犯”，认为艾氏所言过于夸大共产主义的“善意”，^⑥并称韩国教会将“为战争的胜利战斗到最后”。^⑦

由此可见，至少从美国军政厅时期和第一共和国时期开始，新教就已经表现出了激进的政治参与倾向，政治势力化程度也最为完备，完成了政治化过程。军政厅与第一共和国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亲基督教色彩，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使得“反共”这一“嫌恶政治”被恶意利用，从而为新教“反共”的宗教信仰蒙上了一层政治外衣，“反共”这一冷战时代的主题成为新教与国家权力结合的重要媒介。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新教把持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纠割最为严重。

1960年的“4·19”革命彻底摧垮了李承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韩国社会也因此出现了一次新的社会变革，民主的气氛有所松动。然而，这种民主萌芽却因“5·16”军事政变而胎死腹中，韩国由此进入长达30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军事独裁的政治激变自然也影响到了宗教界。“4·19”革命后，与李承晚关系比较密切的教会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在自由党政府时期新教曾经积极协助独裁统治并在“3·15”选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韩国教会内部在“4·19”革命后出现了反省的声音。1960年5月，历史最久的新文安教会青年教徒要求净化教会，称“韩国教会不能无视舆论要求教会内部偿还青年人血债的呼声”，监理会总理院理事会表示将调查和处理参与“3·15”选举的教职人员。^⑧然而，这种净化与反省并不彻底，未能扩大到整个教会层面，^⑨政治依附的惯性未能彻底改观。“5·16”军事政变之后，韩国基督教联合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称“‘5·16’革命是为了将祖国从共产主义侵略中拯救出来，

① 1956年4月30日〔韩〕《基督公报》。

② 1960年3月1日〔韩〕《基督公报》。

③ 〔韩〕金兴洙：《韩国战争与祈福信仰扩散研究》，首尔：韩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所，1999，第60～61页。

④ 〔韩〕金养善：《韩国基督教解放十年史》，首尔：大韩耶稣教长老会总会宗教教育部，1956，第89页。

⑤ 〔韩〕金兴洙：《韩国战争与祈福信仰扩散研究》，第62页。

⑥ 〔韩〕金养善：《韩国基督教解放十年史》，第142～143页。

⑦ 〔韩〕白乐俊：《韩国战争与世界和平》，《思想界》通卷第3号，1953年6月，第9～10页。

⑧ 1960年8月9日《Christian新闻》。

⑨ 〔韩〕徐宏日：《四月革命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1988年4月，第118～119页。

重建陷于不正与腐败的祖国而不得已的行动”。^① 基督教虽然也敦促军方尽早实现民政交接，但仍然与持“反共”和亲美立场的军方保持着合作关系。

然而，军政府随后的政策却成为宗教界进步与保守势力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1965年7月，金在俊、韩景职、咸锡宪等215名宗教界人士发表反对国会批准韩日协定及附属协定的声明，标志着宗教势力开始正式介入现实政治。从此，韩国全境的教会也都超越了相互的教派界限，举行了“联合救国祈祷会”，反对批准韩日协定的声浪愈发高涨。代表保守教派势力的大韩耶稣教长老会则以另行召开“破除国难祈祷会”的形式反对韩日协定。^② 1969年的“三选改宪”也引发了宗教界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成为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保守势力与积极开展社会参与的进步势力出现重大分化的一个分水岭。泛基督教主义（ecumenical）基督教阵营人士大都参与了“反对三选改宪泛国民斗争委员会”，在反对的运动中率先垂范。金在俊牧师更是担任了“泛国民斗争委员会”委员长，呼吁宗教人士参与反对改宪运动，严厉批判政府的不当行为。^③ 金润灿、金俊坤、金章焕等基督教保守人士则批评金在俊“反对改宪委员长”的身份系盗用圣职权，与泛基督教主义基督教阵营出现对立。为对抗“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NCC），部分保守教坛的教会组成了大韩基督教联合会（DCC），支持朴正熙的“三选改宪”。^④

基督教内部的这种保守与对立在1972年“十月维新”时进一步恶化。1973年4月，以“复活节联合礼拜事件”为标志，新教正式推动反对维新民主化运动。参加礼拜的人士由于严厉批评维新体制，并散发要求恢复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传单而被朴正熙政府以国家内乱罪为由逮捕。^⑤ 随着维新体制的推行，韩国国内人权状况迅速恶化，基督教领导人以匿名方式在国内外发表《韩国基督教徒宣言》（1973年）。^⑥ 该宣言由于宣扬韩国教会的民主化和恢复韩国人权斗争的合法化而被称为第二个“巴门声明”。之后，泛基督教主义阵营不但在改宪请愿百万人签名运动、民青学联事件等民主化运动中十分

积极，更于1974年4月在NCC中设立人权委员会，强烈要求政府改善人权状况。^⑦ 尤其在1975年5月第9号紧急措施令颁布之后，媒体、出版、领会、结社等事实上已经成为非法活动，教会几乎成为韩国民主斗士最后、也是唯一的堡垒。

新教势力的民主化、人权运动由于遭到新军部的压制而停息了一段时间，但1982年3月火烧釜山美国文化院事件后，新教势力以反美自主化口号为旗帜，重新恢复了民主化运动。这一时期新教的社会运动十分重视实践活动，各种面向基层民众的组织相继建立。除NCC、EYC（韩国基督教青年协议会）、KSCF（韩国基督教学生总联盟）、城市产业宣教会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展民主化人权运动的团体之外，全国牧会者正义和平实践协议会、基督教农民会、基督劳动者联盟、基督女民会等各领域的团体也先后组建，基督教社会运动的外延不断得以扩大。民主化运动过程中植根于民众与产业宣教的“民众教会”从1984年起也发展成为基督教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力量。同时，自解放后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的YMCA也在70年代后重新恢复了生

- ① [韩]金容福：《解放后教会与国家》，载韩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院编《国家权力与基督教》，首尔：民众社，1982，第206~207页。
- ② [韩]金容福：《解放后教会与国家》，第208~210页。
- ③ NCC于1969年8月8日发表声明称，“对于这种导致国家舆论分裂与国力走弱的三选改宪之议，本人深表忧虑和遗憾”，表达了反对改宪的立场。1969年8月10日[韩]《教会联合申报》。
- ④ 1969年9月14日[韩]《教会联合申报》。
- ⑤ 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编《1970年代民主化运动与基督教》，首尔：韩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院，1983，第159~160页。
- ⑥ 《座谈会：1973年韩国基督教徒宣言形成的经过》，《韩国基督教与历史》1998年第9号，第331~357页。
- ⑦ 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编《1970年代民主化运动与基督教（II）》，首尔：韩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院，1987，第469~487页。

机，在市民社会运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当时的政治情况来看，进步宗教势力所从事的社会参与活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保护工人、农民、贫民等下层民众生存权的人权运动。保守宗教势力眼中的宣教只是限于传播“福音”的自由上，而进步阵营的宣教则更强调“世界的人类化”和“解放”，其反映下层民众生存权的意志更为强烈。这种宣教活动已经具体化为产业宣教、贫民宣教等形式，这自然会成为军事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视之为抱有其他动机的政治干涉。这恰恰就是保守与进步宗教势力两大阵营不断冲突与对立的根源所在。进步阵营为对抗政府的压力，甚至组织了一个“宣教自由守护对策委员会”，此举正是由于进步阵营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宣教自由权利。

在这一时期，权威主义政治权力与保守宗教势力打击进步宗教势力阵营社会民主化运动的主要理论武器就是韩国宪法所确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新军部政权批评称，进步阵营宗教人士的社会运动已经违反了政教原则，保守宗教阵营也攻击称这种社会参与是脱离了宗教本意的政治介入与干涉活动。如此一来，政教分离原则已经成为打击权威主义政治权力与保守宗教势力的“尚方宝剑”。基督教保守阵营以政教分离为由，无视政治现实，甚至向威权屈从，与政治权力保持合作。1973年5月召开的总统早餐祈祷会中，韩国大学生宣教会（CCC）代表金俊坤牧师将“十月维新”称为一种“精神革命”运动，并为维新的未来祈福。^① 8个保守教坛联合体，即“韩国耶稣教协议会”（KCCC）在1974年11月发表《基督教反共时局宣言》，对泛基督教主义阵营进行攻击，称在非常时期内部分圣职人员煽动反政府批评和示威是“不理性的”，只能是有利于“北傀”的利敌行为。^② 韩国教会与政治的这种纠结关系在全斗焕“12·12”军事政变时再次上演。在全斗焕镇压光州事件而取得权力后出任国家保卫委员会常任委员长的祝福会上，保守教坛甚至将之称为“为了国家的早餐祈祷会”。韩国基督教会的23名圣职人员在祈祷会中祈福的情景甚至通过KBS、

MBC等韩国最有影响的媒体进行了直播。全斗焕等新军部势力于1980年10月公布了修改后的宪法，并成立了国家保卫立法会议，相继修订、颁布了《国家保安法》、《社会保护法》、《劳动关系法》等限制民众权力的一系列法律，之后又通过1981年2月的总统选举人团选举和3月的国会议员选举，第五共和国政府正式上台。

由上可知，在军事政权时期，宗教界的政治参与在各种宗教内部保守进步势力的相互牵制下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保守阵营一向坚持政教分离原则表象下的政经纠结，而进步阵营则在“社会参与”的名义下展开了以产业宣教等特殊传教活动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

三

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军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韩国政治开始步入民主化时代。军人权威统治的结束使市民社会的声音逐渐高涨，各种市民运动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登上韩国的政治舞台，许多宗教非政府组织也相继出现。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在环境运动、生命、人权、和平、消费者权益运动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1987年推行直选制后第一次总统选举及之后的各种选举中，宗教界开展了积极的选民运动来推动公正选举的实施。“公明选举实践基督教对策委员会”（简称“公选基委”）开展了诸如监督不正当选举、推动政策选举的政策运动，以及候选人选出资格与政策监督、改革选民认识等多个方面的选举运动。在200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基督教总选连带”、“天主教总选连带”、“佛教总选连带”等相继成立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选举运动。这些运

① 1973年5月6日〔韩〕《教会联合申报》。

② 〔韩〕张奎植：《军事政权时期韩国教会与国家权力》，《韩国基督教与历史》2006年第24号，第108~109页。

动虽然有违反选举法之嫌，但有腐败嫌疑的候选人大多数被拉下马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了市民运动的力量。民主化之后宗教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这些运动忠实地履行了“监督权力”的本义，基本上遵循了市民运动与政治权力保持紧张关系的“大原则”。

到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时期，进步势力的上台激发了保守阵营的“大反击”，以“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简称“韩基总”）^①为中心的保守新教走向“政治行动主义”，即所谓“祈祷会政治”。卢武铉上台后，“韩基总”就多次作出政治言论和举动与政府对抗。2003年新年时在首尔市厅广场召开的“国家与民族和平祈祷会”上，“韩基总”首开先河的“祈祷会政治”成为介入政治的信号弹。新教保守势力相继以“绝食祈祷会”、“国民和谐祈祷会”、“救国祈祷会”、“痛哭祈祷会”、“烛光祈祷会”、“非常救国祈祷会”等名义在首尔和韩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集会活动。^②这些集会虽然有着祈祷会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时局集会。

从组织上讲，“韩基总”由60多个保守教坛组成，但发挥实质性主导作用的只是少数大型教会领导人，各教会的意见也并非由下而上传达，而是将少数领导人物的政治判断以“韩基总”的名义下达。由于各大型教会的牧师也都持保守右派立场，因此“韩基总”的声明或集会也大体上体现了右翼势力的立场。“韩基总”的政治主张极度保守，右翼和守旧色彩浓厚，这一特征可以从“韩基总”的主要观点得到充分反映。在《时事杂志》选出的最有影响力的八大媒体中，只要与“韩基总”相关的议题，无一不是拥护既得利益者权益和反对进步倾向的。同时，在“韩基总”的相关报道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与政治相关，其更是谴责朝鲜人权、反对收回战时指挥权、反对反美情绪、坚守国家保安法、要求弹劾总统等绝大多数保守政治的代言者。^③

在“韩基总”等守旧右翼势力表现出强烈政治势力化倾向的同时，一些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新教非政府组织也不断出现。2004年11月，以徐京锡牧

师为中心组建的“基督教社会责任”就很有代表性，奉行福音主义圣典《洛桑信约》（1974年）“基督教人的责任”。与“韩基总”以少数大型教会和战争世代为中心的政治参与形式不同，“基督教政治责任”坚持“中道统合”这一区别于守旧右翼势力的理念。然而，从根本上讲，“基督教政治责任”提出的“中道统合”只不过是一种修辞说法，其实质也是保守新教的势力化。与其说是保守与进步的中道主义，倒不如说是与韩基总、基督党等极右势力相比较下的中道主义。^④2005年11月，金振洪牧师建立的“新右派全国联合”主张新右派运动在层次上不同于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形式，而是一种“国民运动”，其尤其强调“价值观”是实现“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的精神运动”和“文化运动”，^⑤在政治倾向上强调与“旧右派”的不同，^⑥既批评“左派”，又强调与守旧“右派”的不同。同时，由于“新右派全国联合”自称是一个“超越宗教的非政府组织”，为特别强调对基督教的认同，该组织于2006年6月另行建立了“基督教新右派”。总的来看，“基督教政治责任”与“基督教新右派”都是有着强烈基督教认同

- ① 韩国国内新教保守阵营的代表性组织为“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简称“韩基总”），一直与韩国新教基督教教坛联合机构“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NCC）处于对立状态。卢武铉政府上台之前，“韩基总”并未过多涉足政治领域，金大中时期的“檀君像问题”爆发时也未与政府出现对立。
- ② 〔韩〕姜仁哲：《韩国的新教与反共主义》，首尔：中心出版社，2007，第26~27页。
- ③ 〔韩〕白钟国：《韩基总式政治与韩国教会的未来（1）》，2007年7月6日《新闻与娱乐》，<http://www.newsnjoy.co.kr/news/articleView.htm?idxno=21565>。
- ④ 〔韩〕张锡万：《追问基督教社会责任的名义与价值：撕掉政教分离原则的外衣》，《基督教思想》，通卷第553号，第29页。
- ⑤ <http://www.newright.net>。
- ⑥ “新右派”这一说法是韩国保守媒体《东亚日报》所创。自2004年11月起，该报就以“新右派运动”这一题目做了一系列关于新保守运动的介绍。

的 NGO 是广义上的基督教新右派。几乎同时,天主教、佛教等宗教也都纷纷成立了“新右派”,一时间“新右派”之风成为韩国宗教界的一种潮流。

韩国基督教的新右派与美国的“新基督教右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国的“新基督教右派”秉承神学原教旨主义路线,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坚持新教保守主义立场。20世纪70年代之后先后组成了“道德多数”和“基督教联合”等多个组织,在政治上支持有着右翼立场的保守共和党,要求积极扩大基督教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①如果说美国的“新基督教右派”是以“伦理议题”而实现政治势力化的新教保守阵营集团,^②那么韩国的基督教新右派则是以维护“反共”理念为中心而实现政治势力化的新教保守阵营集团。韩国基督教新右派同美国的“新基督教右派”一样,通过介入大选成功实现了建立右派政权的政治目标。^③

“先进化”论调是韩国基督教新右派不同于美国的重要特征。基督教新右派提出了“先进化”理论,认为韩国需要超越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基本范式,走向“先进化”道路。这一论调更多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应将人推向无限竞争的市场,适用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正如韩国基督教新右派所言,在金大中与卢武铉政府的反企业情绪、重分配轻增长的政策下,韩国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原动力,左派政策导致韩国始终未能跨进“先进化”国家的门槛。新右派的权力批判功能也完全不同于军事独裁时期民主化运动势力。军事独裁时期进步宗教阵营通过权力批判,试图恢复被权力忽视的民众权利等普遍价值与民主化要求,而韩国基督教新右派批评左派政府的目的则是一种试图重建右派政权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可见,韩国宗教界的新右派虽然采取了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却与追求社会公益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在精神上背道而驰。在清算“左派”的口号下,“新右派”成为“右派”理念的代言人,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集团,在“先进化”的名义下代言特定阶级利益。综合来看,民主化

时代宗教界政治参与的最大特征表现为保守阵营的大反攻。韩基总、基督教社会责任、基督教新右派、基督教等新教右派阵营不断攻击卢武铉政府,并提出了“先进化”论调,攻击卢武铉政府的改革议题。

四

近来,韩国宗教界又表现出通过建立宗教政党来直接参与政治的倾向。宗教政党是以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最积极形态的政治参与,也是宗教政治势力化的最典型形式。在第18届国会议员大选中,不仅出现了有着强烈新教背景的基督教,更有以统一教为根源的家庭党。这两个政党虽然最终因得票率过低而未能进入国会,但却都对下届国会议员选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事实上,基督教得票率本身并不重要,其创党的动机却发人深省。基督教最早的母体是1997年成立的“基督教时局对策协议会”,发挥作用者为保守阵营的领袖人物。从个人经历来看,协议会核心成员金俊坤(CCC名誉会长)、曹永基、金基洙(“韩基总”前会长)等人大都是军事政权时期对军事独裁默认或批评进步阵营社会民主化运动为“容共”行为的一批保守人士。韩国会内虽然相当多的人信奉基督教,但由于受党规所限,无法专意表达基督徒的主张。在开展“政治圈福音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认为现存政党无法充分表达基督教精神,萌生了创立基督党的动机,试图单独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政党。基督党的党章对此有着充分反映,即所谓

- ① [韩]裴德万:《美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运动》,首尔:netbooks 2007。
- ② 创立“基督教联合”的Pat Robertson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与基督教不可并存的敌人。见[韩]裴德万《美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运动》,第67页。
- ③ 在此过程中,金振洪牧师曾因违反选举法而遭到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起诉。2007年11月10日[韩]《中央日报》。

“敬畏上帝而非党首，重视圣经而非党论”。^①韩国基督教建立基督教政党的冲动并非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对于韩国基督教而言，基督教政党与基督教国家泾渭分明，基督教国家是以基督教法来统治国家，而基督教政党只是以“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精神”来操控政治的一个手段，^②从而建设一个反映并实现“上帝意志”的“上帝国家”。由此可见，基督教政党的成立对外虽然宣称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却是为了扩大基督教自身的利益，这一动机在党纲中表露无遗。如基督党就坚持要求废除在周日举行国家考试，降低教会基础设施负担金等，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特定宗教的利益。所以，保守阵营主导下的基督党如果成功进入国会，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和平、正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代言人，而更大程度上只是代言教会的制度利益。

由上可知，自朝鲜半岛光复之后，韩国的新教与政治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表现形式也随着时代

政治特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李承晚政府时期，新教参与政治的形式更多地表现为与政治权力的合作，以确立在政治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而在军人政府时代，宗教界的左右对立也影响到了新教的政治参与形式，左翼进步势力与政府处于对立与斗争之中，不得不采取社会关怀和产业宣教等形式，而右派保守势力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政治的追随与合作。至民主化时代之后，新教的发展非常明显地“右转”，对于政治的参与与影响更大地表现为以保守阵营为主导，以教坛联合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政党等形式，表达基督教的政治存在。

① [韩] 黄永植：《老少和谐运动中央会》，2004年2月8日《基督教新闻》。

② [韩] 金志方：《崔寿汉长者访谈》，《政治教会》，首尔：教养人，2007，第211页。

Analysis on the Involvement of Protestantism in Politics of South Korea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Relig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uth Kore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Protestantism has taken an advantageous political position, being relatively intact politically and structurally. The anti-communism and special support by the U.S. and South Korean authorities blurred the divis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Since the 1960s religions began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politics and there were contradictions and competitions within religions.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religions was shown i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era of democratization,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religions was the counter-attack by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In other words, conservatization was the trend in religious circles. Another direction of this conservatization was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religion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political parties were formed among various branches of religions so as to gather maximum political forces.

Key words South Korea; Protestantism; Political Involvement

Authors Zheng Jiyong Ph.D, teacher of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